

# 国学与新行为金融学

——《道德经》行为策略启示录

李国旺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 国学与新行为金融学

——《道德经》行为策略启示录

李国旺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哲强  
责任校对：孙蕊  
责任印制：丁淮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与新行为金融学 (Guoxue yu Xinxingwei Jinrongxue) —— 《道德经》  
行为策略启示录/李国旺著.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049 - 6295 - 9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国学—应用—金融行为—研究  
IV. ①F83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9926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 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 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 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37

字数 620 千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6295 - 9/F. 5855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 序 言

阎庆民<sup>①</sup>

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完全由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可能正常运行，国家宏观政策（看得见的手）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内生因素，正常稳定的经济金融运行是市场与政策平衡的产物。国家宏观政策的行为既是客观经济运行的反映，又是传统文化决定的价值取向的结果，因此政策是现实经济力量博弈与传统文化力量选择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是市场主体中利益各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sup>②</sup>

老子学说详细解释国家政策及其行为背后的规律，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讲，老子是将国家的政策行为通过“价值规律”纳入“行为金融”的研究范畴，有效解释政策行为的规律及作用后果，从而扩展了行为金融学的内涵。国家政策不仅成为市场经济的组分，同时又是国家资本在与市场利益各方关系协调过程中实现保值增值的基本工具。国家政策在本质上具有二重性，即政策既有面向全体机构或个体的全面性与公益性，同时又有追求国家资本保值增值的特殊性与利益性。

在老子学说中，国家政策行为要理性化，必须符合下列要求：政策面对自然规律要顺从；政策面对价值规律在经济领域政策要“无为而治”，对居

---

<sup>①</sup> 阎庆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重庆大学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6页。

民资本要轻徭薄赋；政策面对社会领域要“有为而治”，建立充分的保障制度；政策面对国际资本要以国家安全、和平外交为主题、政策面向内政要以“和谐社会”为导向；政策面对行政权限，要确定行为边界，防止以行政代替法律等。老子将国家行为精细化，通过国家政策的行为特点及其作用方向预测对市场的作用。李国旺先生借用老子的思想资源，将政策行为纳入投资策略的基本组成，通过细分政策行为，为宏观政策在资本市场中的调控效用最大化提供了一种新型思路。具体讲来，要实现政策的边际效用最大化，需要做好下列工作：

一是在经济领域提倡“无为而治”，但在制定规则上要“有为而治”，为市场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政策既要考虑本身“有形之手”作用的功能、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目标，还要换位思考，要从“无形之手”即自然规律及居民利益、机构利益和国际资本利益的视角审视政策作用的效果及其反向作用力。政策作用的方向是百姓能够真正得到实利，百姓能过上可持续提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政策顺从、尊重自然规律与价值规律，尊重市场规律的自我运动要求，只有在自然失灵（灾害）、社会失灵（动荡）、市场失灵（危机）时，才需要出台新政策，对自然、社会和市场失灵部分进行及时而适当的校正。一旦市场自组织力量恢复，就宜退出政策，让价值规律主导市场运行，为此要制定合乎价值规律的游戏规则，让国际资本、机构资本、居民资本在公正、公平、公开的规则中按约定的游戏规则进行竞争或协同，从而调动国际和国内两大资源、两大市场的力量。

二是政策在社会领域要“有为而治”，但具体操作上可“无为而治”，借用市场机制与力量达成政策目标。在现代社会，除了国防、司法、救济、保障、环保、慈善等事业外，还有交通、通信、供气、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衍生出新公用事务和新公益事业。凡是公益事业，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而是要国家出面让公益为主导，以市场为补充，保障居民的基本的生存权和保障权。在国家安全、司法公正、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社会救济、慈善体系及环境保护建设方面，国家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任务，应当“有为而治”。当然，国家对公共事业也不一定要直接下海“操盘”，一些社会公益或公用领域仍然可以引进市场力量，通过公平的规则进行“选秀”，筛选优秀的管理公司管理国有资本，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从而发挥市场机制和

力量的功用。

三是通过制度建设，弘扬正义力量，抑制人性之恶，打击金融犯罪，保障经济社会和谐稳定运行。人性中不仅存在善的力量，同时存在“恶”的力量。当单纯追求剩余价值的恶的力量超过承担社会责任的善的力量时，经济危机的种子就在市场上发芽，“恶”的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环境破坏、市场失灵，出现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的危机。政策的力量就是制定相关制度，让企业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承担与其对称的社会责任。政策可限制“恶”的负面的力量扩展，抑制“恶”的力量的消极影响，但无法消除它，只能调和它。因为以效率提高为特征的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伴生物。这种追求只要合乎国家制定的法律边界和社会道德边界，就得让其“合理”存在。国家的作用是通过税收等形式进行“转移支付”，通过发展公益、保障和慈善等公平事业来平衡片面过度追求效率的负面作用。

四是科学政策的制定要建立在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的基础上。政策取向公平统一，平等对待所有的机构与居民。平等与公正，是政策的生命力，也是政策的公信力所在。政策的作用就是发挥公平力量，让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让人人享受公平与正义，居民在公平的环境下才能产生稳定感和幸福感。如果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平衡的政策，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有机结合，绝大多数人才会有“归属感”、实现感、稳定感和幸福感。国家要如大地一样承担社会责任，保护机构和居民的安全，为机构和居民提供公正的司法、社会和医疗保障，在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发生时，及时提供慈善和救济。政策在公益事业、安全保障、社会福利上的担当，是“厚德载物”精神与品德的体现。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公益事业”，不仅是国家“有为而治”的领域，也是国家为人民创造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基础工程。在当代，安居工程已经不再局限于居住保障，而涉及国家安全、司法公正、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社会保障、环境友好等方面。

五是政策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市场预期不确定的风险。政策如果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潮流所向，就能在公正、公平的条件下保持稳定，政策稳定才能利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为政策目标服务。政策是“看得见的手”，自然规律是“看不见的手”，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只要政策顺从自然规

律，就会借用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运用规律力量为政策目标提供助力。稳定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不为人先”，发挥群众创造性的智慧；“不与民争利”，激发百姓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并勤劳致富；“不与民争权”，充分尊重百姓的创造精神，充分保障百姓发财致富的权益。

六是在对外和平与对内和谐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创新，协同并利用国际和国内两大技术、市场和资源，为百姓的安居乐业创造最大最好的外部环境，也是企业业绩增长的保障。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要实现和平，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国防事业。随着中国现代的发展，当陆地中国向海洋中国发展时，中国的经济活动急需相应的军事力量保护。石油等大宗商品已经是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原料”，保护原料、燃料安全供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诉求。有实力保障的和平是真正的和平。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谈得上进行国内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国家、机构和居民进行全球投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如果国家出面，或许成为国际资本的包围对象或投资对象受国际资本限制而无法进行。因此，国家如果重点放在制定海外投资的基本规则上，为国内机构和居民对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险及金融便利或保障，具体项目放手让机构或百姓自我选择，投资效果或许更好。

七是公正公平的政策取向要符合“三大法宝”，即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政策之“慈”，就是组合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居民资本的力量为百姓谋幸福，集中开发安全、国防、保障、救济等公益产品，为百姓的安宁与幸福提供外在的环境。政策之“俭”，就是量入为出、减少浪费、勤俭节约，取之于民，惠利于民。公益产品的提供，对外在外交与国防上保护国家和百姓利益，对内在慈善、救济、社保和医保上为百姓改善生活创造条件。政策之“不敢为天下先”，即政策取向让利于百姓，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

八是鉴别政策好坏优劣的标准是政策是否造福百姓、是否促进社会科技进步、是否促进国力提高来检测。好政策质朴无瑕、平平淡淡、言简意赅，自然令百姓信服；好政策通过服务大众、保障和救济百姓，创造有利于万事万物及天下众生均衡生长的环境；好政策通过公正、公平、公开的程序，校正市场失灵，化解经济危机。现代资本市场周期出现群体非理性癫狂，多数

人放弃个体理性而听从群体情绪时，政策就起“冰镇”作用，冷却过火的市场情绪。价值规律具备双向运动与旋转运动的功能，群体非理性是价值规律的颠倒反应。价值规律无与争锋者，无人能争，政策只能遵从无事、无为、清静、守法的原则，与价值规律融为一体，才能运用价值规律熨平市场过度的波动，造福国家与百姓。

政策力量在现代金融资本市场的巨大作用，古为今用，或许老子的思想为政策行为科学化、理性化提供值得启发的思路，是为序。



# 序 言

陈雨露<sup>①</sup>

有人说，老子作为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有条件对古代文献整理，通过对“名人名言”进行摘录、整理、精编形成《道德经》。因此，《道德经》是老子在摘编先辈的文献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名人名言录”。有人说，老子是在研究《周易》时，对《兑》卦为基础的十六个卦进行讲解，《道德经》就是《周易》讲座大纲的汇编，这是有人在研究《周易》“方圆图”时得出的结论。这两种讲法都有问题，前者完全否定了老子在理论上的创造性，有些“抄袭门”的味道；后者则认为老子是老师，是他给王公贵族们在高级会所内部演讲“国学”的讲义大纲，特别是《易经》的内部发言提纲而已。

李国旺认为，《道德经》首先是老子为周王朝执政治国的“操盘谋略”。为了实现周朝的长期执政，老子认为，平天下者要摆事实、讲道理、守信用。如果对照儒家的学说，摆事实和讲道理相当于格物致知，守信用相当于诚意、正心、修身。“摆事实、讲道理、守信用”是《道德经》对后人的最大敬告和最好的“投资策略”，即人们想在日常的生活获得利益取得进步，得先看事实，再讲道理，得守信用。因为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离不开功名利禄的诱惑与包围，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如何深入群众而不损害群众的利益？摆事实、讲道理、守信用，是老子为当时的统治者和后来者提供的在利益场中优化处理利益关系的解决方案。摆事实，就是在当下的历史时空下，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主观条件的优势、劣势、机会与风险何在；讲道理，就是要遵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自作主张，不主观盲动；守信用，就是遵守大道在人间展现的各种游戏规则，如政策制度、法规规范、行业自律准则。在资本

---

<sup>①</sup> 陈雨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市场，讲道理、守信用不仅适合于以散户名义出现的居民资本，也适合国家资本、机构资本还有国际资本。不管这四方资本如何进行利益博弈，都离不开人间的“信用”关系的高效处理和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遵从，否则如何得到利益，也会如何失去利益。

孔子事实上是春秋末期研究“人间利益”博弈的首位“首席经济学家”。孔子研究经济利益时，是为了新兴的利益集团服务，他的理论是为维护国家资本或机构资本集团的利益获得、舆论制造、限制百姓等服务的。孔子利益研究主要体现他在《易经》研究心得上：“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儒家认为提高执政能力，发挥国家资本的作用路线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通过主导舆论，利益集中，让国家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了不让居民资本沾边，防止居民资本追求利益而设立各种礼仪法规。这种礼仪法规，在运作过程中，与孔子提倡的“忠信”、“忠恕”的个体修养，在事实上存在冲突。因此，孔子看来，凡是有利国家资本保值增值的就是有道理的。国家资本保值增值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执政能力。

与之相反，老子的《道德经》，事实上是面对周朝统治者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定制报告”大纲，关于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基本道理、方针政策和解决方案，与孔子的道理不同。老子认为，无论国家资本如何强大，要想让国家资本真正做到为提高执政能力服务，管治者首先要遵守自然规律（道）、尊重价值规律，在此基础上平衡天下（国际资本）、天子（国家资本）、诸侯（机构资本）、百姓（居民资本）的利益关系。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只有通过简政放权，让百姓幸福，藏富于民（发展居民资本），形成硬实力与巧实力，才能实现国力遍及天下，天下人无法预测国力强度的力量。为此，遵守“执政三宝”中的“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不能搞“禁民为非”那一套。因此，李国旺认为，老子《道德经》的读者对象是统治者或社会精英，不可能是普罗大众，因为“自损者益”，损上才能益下；“损上”才能让百姓受益，才能在“无为而治”下，在富民的过程中，实现强国的目标。

当然，老子在准备《道德经》这份“定制报告”时，按论文的要求，肯定对过去的名人名言进行了整理、摘编和文献回顾。在此基础上，特别对《易经》中有关治国思想进行了“创新”与发挥。老子当时是统治阶级的精

英成员，理论地位高，经常与贵族们“混”在一起，对上层社会的内幕很熟悉，对周朝上层统治者存在的问题特别了解，但他又是独立研究的学者，旁观者清。因此，他的思想是在独立的“无求”的状态下，从中立和独立的视角，面对周朝统治出现的危机，对周朝统治者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如何长期执政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或投资策略。

可惜的是，周朝统治者沉迷于物欲，不思进取，既不能控制诸侯（机构资本）的横征暴敛，又不对诸侯有起码的尊重，在“烽火戏诸侯”即玩弄诸侯的时候，反被诸侯抛弃。在处理天下（如国际资本）、诸侯（如机构资本）和百姓（居民民间资本）关系上，周天子（国家资本）开始是“无为而治”者，根据“反商”行情的贡献程度，分封建了八百诸侯。由于诸侯间利益争夺，特别是对百姓人口与土地的争夺，在春秋末期，诸侯国大为减少，逐渐形成几大诸侯寡头垄断天下的形势，搞垄断性竞争，将周天子放在了一边。结果呢，百姓受苦，居民资本的利益大大受损。

孔子当时处于江湖地位，属于民间草根“经济学家”，因此对于权力，对于进入主流社会有强烈的需求。儒者，就是满足人们对于权利名利等欲望的学问。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孔子提出的执政方案，往往与老子不同，是当时社会“新阶层”对进入主流社会的新需求。

为什么老子的道家思想千家不衰？仔细考察，由于老子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案是从自然规律出发，从价值规律出发，超越了阶级利益，超越了阶级局限，因此蕴藏了理论的先进性，并能够与社会实践有机融合。

无论古今中外，只有理论的结构与客观事物的运行结构有机对称时，理论才符合真理的要件，即理论的创立、传播、实践、发展过程，只有合乎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到民众的响应与拥护。比如在现代，商品与服务如果符合民众的真实要求，自然会受到欢迎。理论一旦掌握群体，就会变成无穷的力量。而只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被普通大众所掌握的理论，只有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的理论，才能得到百姓自觉的拥护，才能化成大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理论才能转化成无穷的物质力量。如果讲的道理太抽象（无），不能给群众带来实惠（有），群众就会认为这是理论说教，是在讲大话，讲假话，不会上理论的“当”。因此，李国旺先生对《道德经》

进行现代化解读，特别结合至2011年已经有1.5亿开户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需要进行通俗解读，进行古典哲学与现代资本市场进行无缝对接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的前提是以《道德经》为代表的国学理论符合理论先进性的三个条件：

一是理论的先进性建立在人类文明的科学成果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继承者。这就需要以一种开放的理论心胸面对各种思潮，对于不同思潮的合理内核进行吸收、改造、重构与提高，从而形成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有所扬弃的理论发展的科学关系。中国古典文化，建立在对于天文的科学观察和对自然万物周期循环的观察基础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人类可能为了自身利益造假，但无法对天文现象造假，当然也无法对季节变换、自然周期循环造假。因此，国学的合理内核，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的观察与推论基础上的。当然，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人类对于天文地理、四时循环、五运六气的观察研究会更精确。但这些研究依然是“骑”在古人的肩膀上的。只要人类还是以肉体形式存在，只要人类仍然需要吃、喝、玩、乐、行、住，人性就亘古不变，古代的一些科学结论仍然可用于观察现代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实践，比如自然周期引发的人性非理性引发形成的周期循环理论，比如对称平衡理论，比如逆群体情绪的“以柔克刚”理论，都可以运用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实践中。

二是理论的先进性必须与最广大的民众群体的需要相一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社会上人民大众的真正需要，与理论上讨论的民众需要，与政策提供者所认为的群众需要，未必都一致，有时由于利益主体代表的利益不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而认知错位恰是导致政策错位、政策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内在原因。与自然规律特别是时间周期相结合、与人性最基本的需求相对称的政策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在中国古代，“不误农时”，才能满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这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立国，就非得对春、夏、秋、冬四季循环有精确的观察不可，以此制定科学的历法，才能让百姓生产生活有个科学依据。考察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对于农业生产需要的历法，对于自然灾害的预测，是当时最重要的制度。精确的历

法建立在持续的天文观察基础上，为此，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天文观察与记录的档案，从而为中国古代农业的高度发达提供了基本的科学支持。这种建立在天文基础上对于农业生产的预测，至今仍然有效果，因为在现代的CPI结构中，食品的比重仍然占三分之一强。比如根据天文观察结果，李国旺在2010年底作出2011年上半年可能出现干旱的预测，就已得到事实的验证。干旱将会引发减产预期，减产预期引发物价上升预期，物价上升预期引发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引发货币紧缩政策，货币紧缩政策引发股市群体心理焦虑，从而导致行情震荡，这是2011年春夏期间股市行情上下震荡的内在机理。

三是理论的先进性必然与当时的时空结构相一致。所谓投资是否成功，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讲的就是能否成功达成理想目标，需要与时机的配合。中国人讲究投资成功的条件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齐备。“天时”是时间结构概念。不同时间状态下，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力量比较是不同的。在合适的时间，与主导力量的作用方向一致，顺应市场，赢面才大。“地利”是地球物理的空间结构概念。在确定的时间结构中，具体投资什么行业与什么地区的行业，大有讲究。同一行业的不同公司，除了政策、管理、技术、市场、资源因素外，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就有不同的制度环境和成本结构，利润前景也不同。筛选最有利润前景的公司，是成功投资的保证。“人和”既有内在的身心平衡，也有内部的团结协作，更有外部的协同协调。在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居民资本四方力量博弈过程中，国家政策是“人和”的重要内容，因为政策对市场产生直接的强烈的影响。若能顺应政策，运用政策的力量实现管理目标与投资预期，就能利用政策的力量实现更大的“人和”。因此，“和气”的确是能够生财的，因为和气是协同天、地、人的基本功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有顺应大道的自然之理，投资者才能实现利益增长的目标。

鉴于老子《道德经》理论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李国旺先生用现代语言进行解说后，可读性大增，这种新颖的解读，增进了读者的“修身养性”和“发财致富”幸福感，特为之序。

# 导 读

人生天地间，人们不断地追问：如何顺天时、用地利、得人和？如何离苦得乐、逢凶化吉？如何心想事成、吉祥平安？如何化烦恼为智慧？如何化危机为机遇？如何化风险为收益？如何平衡修身养性与发财有道？

在滚滚红尘中，人们的行为与愿望受天时、地利（理）和人和的制约，快乐并不是有求必应，痛苦不是想抛弃就能抛弃。有些人“临时抱佛脚”，想烧支“高香”就万事大吉，期望往往落空。有求皆苦，乐极生悲，人生不顺利事、不如意事常有十之八九。“吉凶悔吝，生于动者”，只要有行动，痛苦、烦恼、后悔、失望就会交互纠缠，时时纠结，特别是在投资失意时。

古往今来，面对人生中种种迷惑、疑惑、困惑、烦恼、凶险、困厄，不同的圣哲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或“发展规划”。佛家有修持“六波罗密”和“八正道”的道行；儒家有“大学之道”；道家开山鼻祖李聘先生，另辟蹊径，将人生放在宇宙大格局中、放在自然界、放在社会中、放在人世间进行比较、定位、分析、估值。个体要想自己活得好，得让步自然“活”得好；要让自己心想事成，也得让别人吉祥如意；要想自己获得收益，也得让别人有所收获。

老子既给人类共性的“病因”开出了标准化的诊治方案，又为不同的主体开出了个性化的“定制报告”和解决方案。不同的利益主体，无论是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还是千千万万的个体（居民资本）都可以在老子开出的八十一一种（八十一章）配方中，寻找到适配自己的秘方、偏方、单方、复方或人生解决方案。面对八十一一种“中药”配方，有些人读出政治学的意味，有些人读出了谋略学的信息，有些人学到了养生学的秘术，有些人学到了经营学的思想，有些人用来修身养性，笔者从中读出了“行为金融”的理论与“投资策略”的方略。

行为金融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不同。行为金融认为，只要是人就同时受人欲和天理的控制：一是受肉体的脑控制、不断追求自身基因的“良性复制”，围绕满足“饮食男女”（孔子）和“食色”（孟子）这两大主线展开博弈，以满足生理与情感快乐的“离苦得乐”为宗旨，让自己活得幸福，让后代活得快乐，因此其行为受“人欲”控制，所有行为都聚集对功名利禄、酒色财气无限的追求；二是作为文明之人受不同的文化基因控制，要求个体“存天理、灭人欲”，

搞出五戒、八戒、十戒等律条，要求人生要有精神向上和无私奉献的追求。无论是2500多年前的文明人还是现代文明人，都处于“人欲”的索取和“精神性”的奉献的强烈冲突中。内在的本性欲望扩张与外在文明的强制性约束的冲突，导致个体处于焦虑、矛盾、烦恼、冲动中。只要外在的约束弱化，只要群体的行为非常，个体就容易放纵或跟随人性中人欲的非常力量而不断膨胀，即追求自身基因复制效率的最大化。

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脑结构中99.9%都在思想或追求生存、享受、发展即现世欲望满足，只有0.1%左右才想着与崇高、伟大、神圣相关的事情，从而证明国学有关人性善恶二元论的科学性。在正常（道可）态势下，人性是偏向于看得见、摸得着、够得着的利益与实惠，而对看不见、摸不着、够不着的理论或道理不感兴趣。这也是在股市报告会中，投资者希望直接告诉做什么股票明天会涨而不想浪费时间听分析师讲什么道理的“道理”所在，也是人性中“搭便车”心理的体现。

老子认为，大道圆圆，周而复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存在“对价”的对称平衡原理。不想付出，只想获得，这种“搭便车”的心理，或许不同民族都程度不同存在，但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可能最严重地存在。比如，有事时到寺庙里许个愿但在日常生活中不做善事，就想一本万利或无本万利地实现“身体健康、全家平安、当官发财”的愿望。这种投机行为肯定是无法实现愿望的。要想获得就得先付出，无论是祖宗提前为你付出，还是本人努力付出，才能获得相应的“对价”。比如，2007年底，A股市场法人获得流通权与个人获得平均30%赠送股份的“对价”已经交易完成，但许多投资者还想再搏一把，扩大战果，结果在这种投机心理下损失更多。

当然，投资者在独立环境时是理性的，但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变成群体的非理性，群体的非理性反过来让个体变得非理性的：个体有时在群体情绪感染下会犯迷糊，做出常态下莫明其妙的糊涂事，即个体的非理性与群体的非理性共振，非理性行为加剧市场震荡。这是因为，潜伏在人脑中的潜意识支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人们平常想得最多是“饮食男女”（孔子）和“食色”（孟子）等事情。人们的行为因此受“消费结构”控制，都想通过“物质消费”离苦得乐，但往往事与愿违。人脑中的快乐中枢与痛苦中枢是调节人类行为选择的生理机制和物质基础，这是人类作为生物学上的人的“宿命”。无论你所处的文明有多发达，只要你是肉体的人，只要你需要吃喝玩乐，都受脑中生物基因的控制，即每个人心中的理想都是离苦得乐，让自己脑中的快乐中心经常兴奋，让自己脑中的痛苦中心经常抑制。但是在一定时空下，满足离苦得乐的资源有限，总有人得到而快乐，有人失去而痛苦。人们得到了快乐，还想更大的快乐，快乐的边际效用会持续下降，但痛苦的边际效用会持续增加。个体理性地追求快乐，

但未必能够提高快乐指数，无法提高帕累托最优。国学提出解决方案时，要想个体快乐，不能只想要“独乐乐”，先要想想如何“众乐乐”。不仅人类要快乐，自然要快乐，民胞物与，才能实现离苦得乐。

这就是笔者要花二十年时间，从“资本”的视角为大家解读《道德经》并提出投资策略之“解决方案”的缘故。

本书也是笔者二十多年对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理论研究与现代资本市场对话的一次“总结”。笔者的职业是资本市场研究，因此下意识地会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中关于人的本性、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类自身的身心关系等问题与资本市场中人类非理性行为及市场异象进行对比分析。这些对比分析研究的成果，就是读者面前的《国学与新行为金融学——道德经行为策略启示录》。当然，笔者的投资策略建立在老子的“人生发展规划”理论上，讲究“修身养性”与“发财致富”的平衡，因此不同于坊间流传的只讲术数技巧的“投资策略”，而是将投资策略建立在品德与学问的提升上。

20世纪80年代，笔者研究生期间攻读《资本论》原著，师从孟氧教授学习其“经济学社会场论”。“经济学社会场论”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引进了现代物理学研究方法，特别引进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理论成果，从场论中对“价值创造”理论进行创新与改造，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中推论出世界经济运动存在“城乡对立”的本质特征、中国经济崛起过程需要掌握粮食和石油两大战略资源等思想。20世纪80~90年代，石油、铁矿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处于“价值压缩”状态。如果国家政策和国家战略已经形成利用国际资源的思想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而不仅仅是引进外资的话，中国和平崛起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曲高和寡，“经济学社会场论”虽然经孟氧教授的大力营销，在学术“江湖”中泛起些许浪花，但终究没有为“庙堂”采纳，因为开放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基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错研究产生的“经济学社会场论”并不吃香。

结合笔者的社会实践，在孟氧教授的经济社会场论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资本市场的力量模型，即资本市场不仅是多空双方的博弈，还存在国际资本、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居民资本四方力量利益博弈关系。如果关起国门，中国资本市场则是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居民资本之间进行利益博弈。国家资本作为游戏的制定者、裁判员和运动员，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经常会得到超额剩余价值。在开放经济下，国家资本、机构资本和居民资本还面临与国际资本的博弈。进入21世纪，国际资本开始以“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为平台，大肆进行“剩余价值”的国际大转移。国际资本综合运用以粮食、石油、美元为代表的商品、货币、资本进行利益博弈，利用其技术优势、资源优势、金融（资



本)优势、渠道(信息)优势、管理优势、品牌优势,在“微笑曲线”的顶端,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等“复杂劳动”,不间断地进行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因此,现代国际间的“战争”不仅包括“有形”硝烟的热战,还包括“无形”的贸易战、资本战等。当然,如果“无形”战争达不到目标,国际资本就会赤膊上阵,利用其技术优势、舆论优势和军事优势直接发动“有形”的热战,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都是国际资本为控制石油而发动的“新投资银行”业务。无论国际资本如何强大,无论国家资本如何强大,无论四方力量如何博弈,都离不开自然力量特别是时间周期的巨大作用。所有利益力量在自然力量特别是时间周期面前,只能顺从、顺应、遵守而不能对抗,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考察古往今来的理论成果,能够对四方力量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理论解释并提供科学的投资策略者,唯有2500年前的《道德经》才有可能。

孟氧教授以“传道解惑”为人生追求,希望将其一生学术功力都传授于我们,因此将我们这些跟着他学习的研究生们都当做其化身;他在古稀之年不仅自己钻研现代物理理论,也要求我们跟着他学习现代科学相关理论知识。当年笔者本着“孝心”而服从导师的教育安排,囫圇吞枣,一知半解地苦读,但终究与现代物理思想结缘。

本书的内容反映了笔者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情况,主要有下列特点:

一是引进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理论、相对论和宇宙学思想,从而比较清晰地解释了“道”作为自然规律、自然现象、自然特征与社会经济运动的关系,特别是现代科学对于理解古典哲学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诞生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成为解开中国古典哲学之谜的钥匙。比如,当笔者读到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时,恍惚间感觉霍先生似乎是用现代科学知识对《道德经》进行解读。社会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和自然的影像,一切社会现象,即使是颠倒反应,都可从自然现象中发现其影子,自然科学因此成为中国化行为金融学的助力与翅膀。

二是引进《道德经》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对新出土的文献,用括号注明,让历史上的一些注释误会尽量减少。历史上对《道德经》的解释、注释汗牛充栋。在这些研究“大家”面前,笔者不过是“小儿科”。有史以来的大家研究《道德经》经常从养生、哲学、权术、谋略、兵法或政治学上进行解释,笔者或许在当代资本市场的红尘中待的时间太长,思维中总有一根“抛锚”的中轴线,下意识用“资本”的视角来衡量各种理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面对几乎高不可攀的《道德经》,笔者仍然抱着“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从行为金融角度对《道德经》进行新解,以此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一种区别于西方行为金融或坊间流传的以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为基础的“投资策略”思维,以求帮助投